



# 江南文人怎样以“清雅”抗衡“粗俗”

——陈江教授在“东方讲坛·思想点亮未来”系列讲座的演讲

## 思想者小传



**陈江**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、古钱币博物馆馆长。著有《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》《晚明江南人士的地方意识与分权思想》等。

不同的阶层、不同的人对生活的追求不尽相同。比如,有人认为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、最高的境界;也有人认为,琴棋书画才是真正的、理想的生活乐趣。应该说,人们在生理和物质生活上的追求有其正当性、合理性。但人生是不是就应该停留在这一个阶段,这是需要思考的。

德国哲学家恩斯特·卡西尔在《人论》中指出,人的本质与一般动物根本的不同,就在于人能从事文化上、精神上的无限创造活动。也就是说,作为一个高尚的、有理想的人,不能仅满足于衣食住行的物质享受,还应该有很多精神上的追求。我们从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中,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精神上的追求。

自南宋以来,经过几次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转移,江南地区不仅成为经济上最发达、最富裕的地方,而且成为文化上的高地,是文人或者说知识阶层的荟萃之地。因此,江南文化虽属区域性文化,但存续了中华文化的根基和主干,汇聚了中华文化的精华,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后期的代表。

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,宋代以后,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在江南保留得最多。有了这一基础,江南文人的许多新动向、新追求,包括精神生活方面的追求,往往辐射全国,在历史上能够产生很大影响。

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,与大家讲讲古代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。由于时间有限,我主要以明代中后期为例。选择这个时间段,是因为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的生活追求很有典型意义,对后人的影响也特别大。而且,晚明江南人士在衣食住行上的追求,还有突破传统礼制束缚的进步意义。

本版稿件选自上观新闻“思想汇”栏目  
栏目主编王珍邮箱:shhgcsxh@163.com

## 明代中后期日常生活趋于艺术化精致化高雅化

明代中后期,江南文人追求那种特殊的、具有高度文化品位和艺术审美性的生活情趣。这既是生活文化发展演进的产物,又与特定时空的政治、社会条件密切相关。

明代的江南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和人文荟萃之地,但江南文人群体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和空前的心理压力。

这种心理压力,一方面来自当朝帝王的刻意打压。

朱元璋对江南文人的猜忌、贬抑是诸多史料明确记载的。他下令苏、松和浙江人士不准到户部当官,且科举考试对江南学子也作了不公正的限制。他还与儿子朱棣多次将江南的窗户,包括许多文化世家,大量迁往北方,家产全部充公。朱棣通过“靖难之役”当上皇帝,更是对江南的文人士大夫肆意杀戮。朱元璋、朱棣以后的明朝皇帝,对江南的文人士

大夫也有很深的偏见。这种心理压力,另一个方面来自富商巨贾的挑战。

明代以来,江南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,工商阶层迅速崛起,由此引发社会的巨大变动。因商品经济发展而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富商巨贾,不仅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,也使传统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社会等级重新编排次序——商贾的地位有所上升,士的地位不断下降。

翻阅明代的逸闻、小说,穷秀才在商贾面前低声下气的描写可谓比比皆是。因此,不说平民百姓的羡慕、崇拜,即便文人内部也不时发出“士不如商”的感叹。

原本自视甚高的江南文人,此时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。政治生态的恶化、社会地位的滑落,使他们的心态陷于空前的复杂和窘困,因而产生了沉重的压抑感和危机感。仕途坎坷、官场

险恶及屡遭贬抑、动辄获罪的政治环境,致使众多江南文人士大夫从心底里生出对官场的厌倦,萌发退隐闲居的心思。

不过,多数江南文人并不认为思隐就必须山居野处、天迹城市。他们认为,最高妙的退隐是隐于朝市和留司的“大隐”和“中隐”。只要志在于隐,无须异于常人,无须匿迹深山。若能自持其心,可不拘其迹,故可亦仕亦隐、心隐身不隐。山水林泉、鸟语花香之类的隐居乐趣,完全可在花园修亭中求得;书斋园林、诗书茶酒,无不可隐。

可见,江南文人有其独特的隐逸观念和方式。他们寄情于精神上的“世外桃源”,游园观景、鉴书画、焚香品茗,追求一种悠闲适意、清幽高雅、艺术化的生活情趣,并借此平衡内心的失落、消解胸中的块垒。

当然,江南文人刻意追求这种特殊的生活情

调和品位,还有另一层深刻的含意,即以文士特有的“清雅”来排拒商贾的“粗俗”。面对穷奢极侈、挥金如土的富商巨贾,江南文人的内心是痛苦而复杂的。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,无论经济实力、物质生活,还是拜金主义盛行之下的世俗评价,文人均难以与富商比肩。那么,以什么东西来自我标榜呢?能让士人孤芳自赏并维持自尊、自信、自傲,且在一定程度上能获得社会认同的,唯有自身独具的文化素养。

在这种状况下,江南文人刻意提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含量,期盼以一种品位清幽高雅、充满文化意趣、高度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来与商贾的“粗俗”相抗衡,从而满足内心的优越感,厘清日益混淆的“士”“庶”之别。

所以说,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将日常生活趋向于艺术化、精致化、高雅化,是在特殊时空条件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样式。

## 园林、书斋、茶寮是士大夫重要的精神栖息之所

从现今留存的文献资料和绘画作品来看,明代江南文人士大夫最心仪的三个去处是园林、书斋和茶寮(茶房)。这可视为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栖息之所。

宋代以来,古代中国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。明代中后期,江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15%左右。据估算,江南八府当时的人口约有2000万,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大约有300万。可以说,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的“城居”现象颇为流行,文人士大夫也多到城里居住。

“城居”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,走亲访友、雅集唱和都很方便。但城市的嘈杂喧嚣,又对文人的生活情趣构成了干扰。既无法脱离城市,又时时留恋乡村,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于是,园林骤然兴起。

若能修建一处园林,模仿并浓缩乡村中的小桥流水、鸟语花香,将悠然闲适的生活意境搬到城里来,就既能获取城市生活的便利,又

可经常享受乡村生活所给予的安宁、静谧。园林的妙处就在于此。

这一时期的江南地区,园林建造特别兴盛。我作过一个统计,仅苏州府一地,明代修建的、见于文献记载的著名园林就有100多座;不太著名或未被记载的,肯定还有很多。

除了文献记载,明代绘画中也有许多描绘江南园林的作品。沈周的《魏园雅集图》,就是其中一件名作。该图描绘沈周等苏州名士拜访友人魏昌,在魏家园林中雅集的情形。众人赋诗作文、抚琴高歌,欢声笑语,一醉方休。沈周以浑厚苍润的笔墨刻意营造出一种山峦林泉特有的“野趣”,借以表现江南文人钟情于结庐尘世的情怀。各位名士在画上题诗抒情,魏昌还题跋记述雅集的经过。这幅画不仅成为美术史上诗、书、画俱佳的杰作,而且为后人留下了江南文人醉心园林的真切写照。

但修建园林是很费钱的,有能力造园的毕竟

是极少数人。无力造园怎么办?古人建宅造园,前后总有一些空地,形成大大小小的庭园。于是,许多人在屋前屋后辟出几个平方,种点花草草,堆几块山石,也可营造出更小、更浓缩、更模型化的“乡村景观”。归有光在名作《项脊轩志》中,即描写了书屋之前的小型景观。

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,又该怎么办?那就摆弄盆景,这可视为最小型的“乡村景观”了。盆景在明代中后期的苏、松等地有很大的市场,以致贩运、出售盆景成为一个时尚产业,道理就在这里。

除了大大小小的园林景观,读书人往往会有自己的书斋。现今留存的大量明清文献中,有不少文人专门谈到书斋的构建、装饰、布置以及其中的藏书、文物、各类文具等。当时的江南文人认为,书斋是精神享受、文化创造的处所,故万万不可布置得富丽堂皇、金碧辉煌,而应该凸显文化品位和学术素养。

## 凭借“孤芳自赏”,保留了几分自尊、自信和自傲

中国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,巴蜀一带早在西汉时期就有饮用茶叶的现象,汉地文人雅士饮茶始于魏晋南北朝。隋唐以后,饮茶逐渐成为一种风俗,流行于朝野。到了宋代,饮茶更为普及,茶叶成为“开门七件事”之一。

明代,饮茶风尚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。宋代盛行的斗茶之风已经消失,制作穿极精巧的饼(团)茶为更接近自然的条形散茶所取代;先前的研末、调膏、煎煮而饮,此时变成直接以沸水冲泡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,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,在讲究茶叶、茶具、水质等物质条件的同时,更注重品茗的环境与气氛,更追求一种具有美学意趣的、艺术化的饮茶方式。

明代有关饮茶的论述使人明显感觉到,在江南文人看来,饮茶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,更是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,是生活情趣的典型体现。为了寻觅一种清幽高雅的品茗意境,往往

会辟出专门的茶房、茶寮。在他们心目中,唯有“凉台静室,明窗净几,僧寮道院,竹月松风,晏坐行吟,清谈把卷”的环境,才能达到品赏香茗的最佳境界。

由于饮茶是清事、雅事,所以江南文人对同饮之人也有要求和选择。陈继儒明确提出,只有“翰墨墨客,缟流羽士,逸老散人,或轩冕而超轶世味者”,才能成为真正的“茶侣”。为保持品茗时的清幽静逸,江南文人对同饮的人数也予以限制,陈继儒称:“品茶,一人得神,二人得趣,三人得味,七八人是名施茶。”

在饮茶的过程中,江南文人会刻意营造清雅闲适、超然物外的气氛,注入特有的精神追求和审美意趣,这实际上已将品茗香茗提升为一种生活艺术美的创造与鉴赏。

明代江南文人的饮茶风尚不仅见于大量的文献记载,而且绘画作品也有非常真切的描绘,如文徵明的《品茶图》、仇英的《松溪论画图》等。

明代江南文人创建的新生活样式,包括特殊的生活向往和精神追求,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。

从生活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,他们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,如衣食住行、社会交往、文艺创作、休闲娱乐等,提供了不少新内容、新品位。

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来看,江南文人以知识阶层特有的情怀志趣,与污浊的官场保持一定的距离;以独具的文化素养,来反复厘清“清雅”与“粗俗”的差别。

在这样的过程中,知识阶层的自觉意识不断被触动和唤起。其中,就包含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群体品格,即以天下为己任,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、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。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、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,不少江南文人正是凭借这样的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,保留了几分自尊、自信、自傲,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,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。

江南文人多将书斋视为自己的出处和归宿。不少人赴京当官时,仍对自己的书斋流连忘返,并时时期盼不久的将来能辞官返乡,回到书斋中去。回到书斋做什么?当然是读书,浏览古今经典名著,还有就是鉴赏自己收藏的文物。

近年来的研究揭示,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鉴赏字画、碑帖、铜器、玉器、瓷器、古版图书等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。文物鉴赏集学术研究与文化消遣于一身。各类文物高度的艺术价值、学术价值,对江南文人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。不少人还以鉴赏文物来标榜自己的清幽高雅。

晚明松江名士陈继儒在《岩栖幽事》中说道:“胜客晴窗,出古人法书名画,焚香评赏,无过此时。”显然,在江南文人心目中,天朗气清,有挚友来访,步入书斋取出珍藏的文物字画一同欣赏,实为人生之快事。反之,如果不是志同道合、深得敬重的诗友、文友、书友、画友、文物藏家,是绝对进不了书斋的。

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世风》中说过一段话:“易姓改号,谓之亡国;仁义充塞,而至于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谓之亡天下……是故知保天下,然后知保其国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天下”,应该说就是指中华民族这个命运共同体,尤其是我们这个民族信仰的文化命脉。

顾炎武作为江南知识阶层的代表,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、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精神发出了穿越时代的理性呼吁。当中华民族共同体遭受侵犯乃至面临被颠覆的危机时,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。

这段话代表了江南文人的普遍认识。事实上,这种认识在关键时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明清鼎革之际,以身殉难的,以江南的文人为最多;清军南下“剃发令”后,江阴、嘉定民众浴血奋战、拼死反抗,也与文化自觉和崇尚气节密切相关。这正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、中华文化之文化精髓的具体体现。(整理人:王珍)

解新日报 消费市场 专版

刊登内容

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 
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 
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 
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 
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52

“感恩我的先生老彭”

从1963年到1966年,我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。在此期间,我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,以及敦煌魏晋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。我先后在敦煌莫高窟、文化路和七里镇的古墓葬,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。一边发掘,一边搞社教活动,一边咬紧牙关,等待命运的转机。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,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。

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,在和家人分别的19年里,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。后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。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,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。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,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,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。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,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,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。

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。我和老彭分居19年,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,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。

1968年,我怀第一个孩子时,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。之所以计划去武汉,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。我从小体弱多病,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,力主我去武汉。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,生了孩子无人照顾,按照那时的制度,产妇有56天产假,产妇的丈夫只

有三天假。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,坚决让我去武汉。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。

可是就在临近分娩的一个多月,我去向革委会请假。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给不给假,还对我说:“哪里不能生孩子?非要到武汉去生。”听到这样的话,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。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,只觉得又气又羞,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!含着眼泪转身就跑了办公室。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,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,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,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。

不仅不能哭,我竟然还接到通知,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。10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,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。敦煌的棉花长得矮,我挺着大肚子,怎么摘?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,劝我不要去,一定要去请假。我赌气说:“我决不去请假,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!”就这样,我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。摘了一天棉花,就动弹不得了。当时,我们吃住都在老彭的家里。老乡很有经验,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,非常同情我,也很为我着急。老乡很善良,她想要给

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,以免发生意外。我说:“没关系,谢谢您!”我没有去求人,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,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。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,我再去申请的时候,已经走不了。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,回到单位没多久,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。我没有任何经验,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,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,哪儿都不能去了,必须马上去医院。

上海家里知道我不会做针线活,在上海为我买好了婴儿的衣服和用品,全部寄到了武汉。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汉生孩子,这样照顾起来比较方便。他还把我婆婆从河北农村接到武汉,准备照顾我坐月子。婆婆特意从河北老家为我带了红枣、小米、鸡蛋等不少营养品。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,就是不见我回去。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,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。

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,只带了一些碎布,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。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,影响肚子里的孩子。如果出了问题,那怎么面对老彭?我当时都不敢想。

到了晚上,我怎么也睡不着,就在那里坐着,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旺旺的炉子,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。现在想来,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,可当时的条件就是有这样。不知什么原因,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,内心极度烦躁。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。我好像忘记了自己在医院,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当母亲,只感到浑身难受、精神恍惚,一心想往外走。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,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。等我找到她之后,她见我神情恍惚,就不停地宽慰我:“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?外面冷。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,可千万不能着凉。”我说:“我难受,想走走。”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,她说:“好啊!那我陪着你吧,咱俩回病房聊聊天。”就这样,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。到了病房,她发现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。怕我再有意外,她就不走,一直陪着我聊天。就这样,我慢慢睡着了。这位护士长对我真好,我永远也忘不了她。

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,我发现床单湿了,以为是自己尿床了,很不好意思。其实我根本不懂,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,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。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,孩子出生了。

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,怎么办?人家说:“你这个当母亲的也真是的,怎么连件衣服也不给孩子准备。”我能说什么,有苦说不出。只能用自己穿的“棉猴”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。孩子那么小,医生说6斤都不到,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。医生接着问:“你怎么是一个人?你丈夫呢?”我说:“我丈夫还不知道。”医生惊讶地看着我:“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,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。”

后来,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。

(二十五)

樊锦诗自述  
我心归处是敦煌  
樊锦诗 口述 顾春芳 撰写

连载